

伙伴关系与抗疫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与伙伴国的相互支持行为

周方银

【内容提要】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已建立起一个体系庞大、结构复杂、覆盖面广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对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与伙伴国的相互支持行为的数据分析发现,伙伴国在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方面明显比非伙伴国更积极。影响对象国对华抗疫援助的主要因素是对象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是否建立有伙伴关系和伙伴关系层级以及对象国的医疗服务能力。影响中国向他国提供高水平抗疫援助的主要因素包括:双方是否建立伙伴关系及伙伴关系层级、对象国此前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中国与对象国经济关系的紧密度。分析表明,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更可能在疫情之初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中国更可能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提供高水平抗疫支持,中国与伙伴国的抗疫合作表现出一定的互惠性。这些发现有助于深化对伙伴关系网络的层级结构、非传统安全危机状态下中国与建交国合作行为特点的认识,对于中国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一定启发。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冠肺炎疫情;伙伴关系网络;抗疫援助;非传统安全

【作者简介】 周方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广州 邮编:510006)。

【中图分类号】 D815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2) 07-0004-30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地区秩序转型背景下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A12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 问题的提出

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一直十分重视伙伴关系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伙伴关系建设被提升至中国外交议程中更为突出的位置。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①标志着伙伴关系建设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②对伙伴关系建设提出更高期许。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伙伴关系并非中国首创,但通过中国外交近30年的实践,伙伴关系建设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与180个建交国中的105国建立了不同性质的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拓展深化的同时,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巨大提升,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重要变化,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使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疑问: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是否能经受大国战略竞争压力的考验,中国是否要放弃“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以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③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检验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特殊窗口,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波及全球,包括中国的所有伙伴国和非伙伴国。这为比较分析伙伴国与非伙伴国处理对华关系的表现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提供了重要观察窗口。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一场在短时间内暴发的全球性危机,很多国家要在突发状态下对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做出反应,这能够较好地展示其真实偏好。抗疫合作在性质上不同于一般的贸易与项目合作,因为在疫情危机背景下向他国提供援助需克服一些国内困难并承受一定代价,是对双方合作态度更有价值的检验。最后,中国与伙伴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合作可以用于考察伙伴关系层级与合作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

分析中国与伙伴国抗疫合作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伙伴国与非伙伴国在新冠肺炎

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②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③ 参见阎学通《中韩结盟是“时代趋势”》,载《领导文萃》,2015年第2期,第25—27页;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21—25页;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疫情早期的危机状态下对中国的援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伙伴关系的不同层级对此是否产生明显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与伙伴国的支持是相互的、带有明显的互惠性质, 还是并非为了追求立即可见的回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本国向对方提供支持的意愿? 中国的伙伴国不乏美国盟国, 这些国家在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方面的行为是否不同?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中国与伙伴国关系的特征, 以及更好地认识伙伴关系网络对中国外交的价值与作用。

二 文献回顾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一方面, 中国已建立起体系庞大、结构复杂、覆盖面广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它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的复杂国际环境, 学界对于伙伴关系网络能否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能否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存在不同观点。关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学术讨论, 主要有四方面争论。

第一, 由于伙伴关系的非约束性, 伙伴关系国家能否相互提供可靠的支持? 伙伴关系是国际行为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① 伙伴关系具有共同利益, 同时双方有为实现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的愿望。^② 戴维来认为, 伙伴外交以双方自愿为前提, 以公开政治承诺为形成标志, 属于政治合作。它不缔结正式盟约, 没有强制约束力, 没有明确期限, 比较自由灵活。^③ 托马斯·威尔金斯(Thomas S. Wilkins)和普拉沙恩·帕拉梅斯瓦兰(Prashanth Parameswaran)认为, 伙伴关系是两方或多方合作的结构化框架, 它以松散和不具约束力的方式组织起来, 旨在追求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和促进未来合作。^④ 就通过伙伴关系寻求国际认可、巩固与他国共识的角度来说, 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是有效的。^⑤

①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2期, 第65—95页。

② 苏浩《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框架》, 载《世界知识》, 2000年第5期, 第11—12页。

③ 戴维来《中国的“结伴外交”战略: 特征、缘由及路径》, 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5年第10期, 第30—38页。

④ 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2, pp.53-76; Prashanth Parameswaran, “Explaining U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6, No.2, 2014, pp.262-289.

⑤ Jarrett T. Wilde and Yue Xing, “Comprehensive Sovereign Agency? China’s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4, Issue 1, 2021, pp.87-126.

在伙伴关系中,双方也通过联合声明等形式做出承诺,但这些承诺是一种软法(soft law),不具有法律约束力。^① 共同利益是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驱动力,^②与此相关,伙伴国之间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共同利益的存在与否及其大小。如果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时期的共同利益减弱,伙伴国家的合作就面临挑战。与非强制性相伴随的灵活性是伙伴关系的一个优点。正是基于其高度的灵活性,中国可以在20多年内与100多个国家建立起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灵活性也体现在当一国需要获取他国提供的有力支持时,对方的支持是否可靠。在灵活性和可靠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关系:高度灵活性意味着可靠性方面的损失;反过来,高度可靠性意味着在特定情形下政策灵活性的降低。

由于伙伴关系存在可靠性不足的问题,在需要他国提供重要战略支持时尤其如此,部分学者提出中国可以认真考虑与他国结盟的可能性,^③或者建立若干“准盟友”关系与联合阵线。^④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打破是否结盟的思维定式,从长期角度动态地看待结盟问题,^⑤是否结盟取决于未来形势的变化。此外,联盟关系虽然提高了合作的可靠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履约问题。在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也存在过度承诺以及部分承诺难以兑现的情况。^⑥ 在联盟关系中,被盟国“抛弃”即关键时刻盟国不履行其安全承诺一直是令结盟国家担心的问题。^⑦ 可见,签订联盟条约虽然会提高相互支持的可靠性,但这种可靠性是相对的。大体而言,联盟关系的可靠性高于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可靠性又高于非伙伴关系。^⑧ 在伙伴关系内部又存在不同的伙伴关系层级,彼此间也存在可靠性差异。伙伴关系虽然没有建立在有约束力的

① 孙德刚《论21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106—130页。

② 郭小琴《信任与利益:伙伴关系管理过程的理论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4—149页。

③ 阎学通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参见阎学通《中韩结盟是“时代趋势”》,载《领导文萃》2015年第2期,第25—27页;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21—25页;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第193页。

④ 王存刚《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120—135页;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20—33页;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57—81页;刘丰《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56—67页。

⑤ 徐进《当代中国拒斥同盟心理的由来》,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5期,第143—154页;徐进、杜哲元《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载《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3期,第1—32页。

⑥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4—28页。

⑦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Issue 4, 1984, pp.461—495.

⑧ 伙伴关系比“临时性”的双边关系要更紧密,毕竟它以两国之间的较高政治共识为基础。参见 Georg Strü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0, Issue 1, 2017, pp.31—65.

条约基础上,但在伙伴关系建立后往往会有一定的机制化建设,如高层定期会晤机制、政府间磋商机制、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以及各级别交流与合作机制等,^①它们可以起到强化沟通、消除误解、减小不确定性、稳定预期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未来合作的可靠性。在这一意义上,伙伴关系具有提供关于国际合作信息的作用。^②

第二,伙伴国可以在经济领域有效合作,但在安全领域伙伴国能否继续有效合作?与此相关,伙伴关系的特点是否决定了其在安全领域的作用存在先天不足?伙伴国在经济领域能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往往是因为这一合作可以为双方带来明确可见的共同利益,在安全领域这种条件未必依然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经济领域中可以更多地发挥伙伴关系的作用,在安全领域中则必须依靠联盟解决安全关切?

周亦奇认为,伙伴关系的特点是和平性,它覆盖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非安全议题,与联盟体系强调军事安全存在明显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很多美国盟国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合作重点集中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领域。他据此认为,在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外交中,有明显的去安全化特征。^③但这些伙伴关系并不能起到在安全上改变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作用。孙德刚认为,与联盟政治和准联盟政治相比,伙伴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政治合作,在安全合作上着力不多且不具强迫性。^④中国的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阶段,一旦涉及高政治领域中的冲突,中国的伙伴外交就会遭遇严重阻碍。^⑤有学者认为伙伴关系可以发挥重要的安全作用,其分析案例往往集中在中俄关系,^⑥而实际上中俄关系在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是一个特殊存在。还有学者认为,经济伙伴具有突出的政治意味,因为它对外传达的

① 肖晞、马程《中国伙伴关系:内涵、布局与战略管理》,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第72—87页。

② Georg Strü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pp.31-65.

③ 周亦奇《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第21—39页。

④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57—81页。

⑤ 孙德刚《论21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106—130页。

⑥ 关于中俄安全合作的探讨参见王树春、万青松《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结伴还是结盟?》,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4—21页;成志杰《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俄合作的新路径》,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9—137页;于游、高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经验与启示》,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51—61页;Michael Cox, "Not Just 'Convenient': China and Russia's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Age of Geopolitics,"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 No.4, 2016, pp.317-334; Jeanne L. Wils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China's Silk Road: Implications for the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hip,"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17, No.S1, 2016, pp.113-132.

是中国与伙伴国相互支持的信号。^① 但这样的认识只是对经济伙伴的一种政治解读,并不足以说明伙伴关系能够在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唐健认为,外交和军事主导的伙伴关系较为稳定。相比之下,经济导向的伙伴关系虽然相对便于建立,但容易受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纷争干扰。中国与他国的伙伴关系主要是经济主导的,缺乏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支撑,使得伙伴关系容易受到波动和影响。^② 因此,中国现有的伙伴关系并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国际竞争,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种观点已经潜在地假设可以建立外交和军事主导的伙伴关系,实际上承认了伙伴关系在军事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孙学峰和丁鲁分析了中国伙伴关系的升级,认为与支点国家或结点国家的伙伴关系更可能实现升级,因为推进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有助于中国缓解崛起困境。^③ 这种观点隐含一个基本假设,即建立伙伴关系不仅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还具有重要的安全作用,通过伙伴关系升级可以强化安全作用,有助于缓解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战略压力。漆海霞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如果中国与某国的伙伴关系实现升级,则该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与中国的立场会趋近,与美国的立场差异会增大。^④ 这一事实意味着伙伴关系的作用不止于经济领域。不过,乔治·斯特鲁弗(Georg Strüver)在分析中国伙伴关系对于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性的影响后认为,伙伴关系对于国际安全问题的作用相当有限。^⑤ 刘博文和方长平认为,大部分既有研究重点关注伙伴关系在经济合作、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内涵和意义,对伙伴关系网络在传统安全层面意义的研究较少,而这恰恰是中国伙伴外交的关键性战略意义所在。^⑥ 他们强调伙伴关系在传统安全层面的意义,显然是基于伙伴关系可以在传统安全层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总体上,当前中国与大多数伙伴国的合作重点在经济领域,同时与部分伙伴国存在不同水平的政治安全合作,其中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在安

① 孙忆、孙宇辰《中国经济伙伴网络中的多重制度联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101—128页。

② 唐健《伙伴战略与伙伴关系:理论框架、效用评估和未来趋势》,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1期,第50—78页;林尚杰《试论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深化》,载《南方论刊》,2016年第12期,第33—35页。

③ 孙学峰和丁鲁对支点国家或结点国家的界定,主要从政治安全角度而非经济角度出发。参见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54—76页。

④ 漆海霞《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论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4—33页。

⑤ Georg Strü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pp.31-65.

⑥ 刘博文、方长平《周边伙伴关系网络与中国周边环境》,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3期,第68—100页。

全领域合作的水平最高。^① 中国与伙伴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合作的比例在未来可能继续提高,也就是说,中国与伙伴国的合作并非只局限在经济领域。^②

第三,伙伴关系在危机状态或大国竞争较为激烈时是否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伙伴关系在危机下的反应速度和作用大小是其效能的重要方面。联盟关系由于明确了军事安全义务,可以在联盟条款触发时被快速激活。相比之下,伙伴关系要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依赖于伙伴国的政治意愿。

在国际体系和平稳定时期,各国相互交往面临的外部环境较为平稳,它们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利益有明确预期,伙伴国可以进行可靠的合作。宽松、稳定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为伙伴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体系权力转移、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国家间关系具有更大变数。由于未以明确的条约把双方的合作义务确定下来,伙伴关系的作用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下面临考验,由此带来伙伴关系的又一个局限:伙伴战略见效时间比较漫长,在面对急迫威胁时难以应对挑战。^③ 当伙伴国出现分歧时缺乏协商机制的保证。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本身不牢固,因此不能与美国稳定的联盟体系相比。^④

不过,在现有国际体系下,战争与武装冲突是大国关系中的特殊形态,当前的大国战略竞争没有表现为大规模和高强度的武装冲突。在此背景下,伙伴关系发挥作用的领域大多是联盟关系并未明确规定权利义务的领域。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是否向他国提供医疗物资、医疗专家组和疫苗方面支持等联盟义务范畴外的问题上,联盟关系不一定具有更大优势。因此,在超越联盟义务领域的广阔国际关系空间中,伙伴关系与联盟关系的利弊是值得探讨的学术和政策问题。

第四,伙伴关系的层级是否与合作水平存在对应关系?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伙伴关系类型繁多,截至2019年年底已经有18种不同表述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类型多样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一种努力,即用不同表述确定伙伴关系的不同层

① 当然,中国与伙伴国的安全合作并不限于这两个国家,如中国与马来西亚也开展了广泛的安全合作,并就共同战略利益达成合作共识。参见 Ngeow Chow Bing,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 but Prosaic Military Ties: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China Defense Relations 1991-2015,"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37, No.2, 2015, pp.269-304.

② 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张锐认为,目前基本成型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政治安全效应。参见张锐《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第40—59页。

③ 唐健《伙伴战略与伙伴关系:理论框架、效用评估和未来趋势》,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1期,第50—78页。

④ 林尚杰《试论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深化》,载《南方论刊》2016年第12期,第33—35页。

次。但类型繁多的表述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困惑:一般人很难理解那些大部分用词相似又存在细微不同的表述之间的差异。中国伙伴关系的架构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①每一类伙伴关系的命名都是经过广泛讨论和内部交流后确定的。^②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存在一定程度战略层次不分明的问题。^③也有学者谈到伙伴关系“名”与“实”不完全匹配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伙伴关系的“名”与“实”之间更关注“名”的作用。^④与联盟关系相比,伙伴关系缺乏正式条约的约束力,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可能出现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但之后双方关系交恶的情形,难免出现一些“名不副实”的战略合作伙伴。为此,有学者建议厘清对伙伴关系的各种称谓,分类推进伙伴建设。^⑤“名不副实”现象不仅带来伙伴关系管理的问题,还可能使外界质疑伙伴关系网络能否反映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进而影响伙伴关系的战略声誉和国际可信性。^⑥还有一些伙伴关系的“名不副实”表现为,部分国家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后,除完成两国元首最初达成的合作项目外不知道应如何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⑦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伙伴外交实际上“只有外交而无伙伴”,只有象征性宣誓而无操作性条款,^⑧伙伴关系类似于“清谈馆”,缺乏实质性内涵。^⑨伙伴关系并非一种有法定约束力的关系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要说伙伴关系普遍没有实质性内涵则忽视了中国与很多伙伴国开展的高水平合作。实际上,伙伴关系不仅在中国外交中具有重要性,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也颇为重视伙伴关系建设,如美国在联盟体系外强调

① Shengsong Yue, “Towards a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Implications,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6, No.2, 2018, pp.5-27.

② Jiun Bang, “Why So Many Layers? China’s ‘State-Speak’ and Its Classification of Partnership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3, Issue 2, 2017, pp.380-397.

③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④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⑤ 戴维来《中国的“结伴外交”战略:特征、缘由及路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0期,第30—38页。

⑥ 刘博文、方长平《周边伙伴关系网络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3期,第68—100页。

⑦ 林尚杰《试论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深化》,载《南方论刊》,2016年第12期,第33—35页。

⑧ Wiktor Adam Sajdak, “Assess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Policy: Does EU-China Dialogue Architecture Fit the Objectives of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Policy Towards China?” *L’Europe en Formation*, No.370, 2013, pp.123-131.

⑨ Daniel S. Hamilton, “The American Way of Partnership,” *Europ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Observation*, Working Paper 6, June 2014.关于伙伴关系“名不副实”的讨论,还可参见张骥《去特殊化的中法战略伙伴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99—117页; Jonathan Holslag, “The Elusive Axis: Assessing th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9, No.2, 2011, pp.293-313.

发挥安全伙伴的作用^①，显然这些伙伴关系并不都是空洞的。^②

通过外交实践检验伙伴关系层级在外交实践中是否起作用是为更可靠的办法，而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与伙伴国的相互支持与援助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检验。此外，伙伴关系层级与在现实中双方提供相应的外交支持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需要结合较长时间段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估。

三 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结构与态势

根据对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外使馆网站数据的整理，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与180个建交国家中的105国建立了18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伙伴关系类型丰富，存在多种不同的关系定位。从宏观上来看，伙伴关系可以分为一般性伙伴关系和战略性伙伴关系。战略性伙伴关系又分为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据是否加上“全面”这个定语又可分别细分为两个大的次类。由此，可以把绝大部分中国的伙伴关系划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除这五种主要类型外，中国的伙伴关系还有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表述。如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唯一使用“战略协作”一词界定的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协作则强调了合作的全面性与战略关系的延展性：既包括双边关系中的全面合作，也致力于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协调立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伙伴关系是唯一使用“全天候”界定的伙伴关系，显示双方合作的高水平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合作的高度稳定性。这两个伙伴关系居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最高层级。

还有一些伙伴关系采用了“全面”之外的其他词汇来表示重视或对关系的特殊定位，如“全方位”“友好”“创新”“互惠”等，有些是为了在同一层级内表示重视，有些是

^① 如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与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报告的很多地方都对伙伴关系的作用进行了强调。参见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访问时间: 2021年5月22日。

^② Colleen Chidley,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lig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ko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Vol.41, Issue 1, 2014, pp.141-157; Vidya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为了突出这一伙伴关系的特色与方向,由此带来同一层级伙伴关系中的一些微妙区别。为便于分析,笔者将它们归入前述五种主要类型,由此可以把当前中国的伙伴关系分为六种主要类型(见表1)。

表1 中国伙伴关系网络(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层级	伙伴关系定位		具体国家
一	最高层级战略伙伴关系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巴基斯坦
二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埃塞俄比亚、刚果(布)、几内亚、柬埔寨、津巴布韦、肯尼亚、老挝、缅甸、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泰国、越南
三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阿富汗、韩国、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苏里南、文莱、印度
四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哈萨克斯坦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德国
		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英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联酋、埃及、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巴西、白俄罗斯、波兰、丹麦、厄瓜多尔、法国、斐济、吉尔吉斯斯坦、库克群岛、马来西亚、蒙古国、秘鲁、密克罗尼西亚、墨西哥、南非、纽埃、葡萄牙、萨摩亚、塞尔维亚、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汤加、瓦努阿图、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斯坦、西班牙、希腊、新西兰、匈牙利、伊朗、意大利、印度尼西亚、智利
五	战略伙伴关系	友好战略伙伴关系	奥地利
		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瑞士
		互惠战略伙伴关系	爱尔兰
		战略伙伴关系	阿曼、安哥拉、保加利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吉布提、加拿大、捷克、卡塔尔、科威特、摩洛哥、尼日利亚、苏丹、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拉圭、牙买加、伊拉克、约旦

续表 1

层级	伙伴关系定位		具体国家
六	合作伙伴关系	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比利时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马尔代夫、罗马尼亚
		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新加坡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赤道几内亚、东帝汶、荷兰、加蓬、克罗地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
		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芬兰
		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以色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网站以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数据整理。

除这 105 个国家外,中国还与其他国家建立或曾经建立了不同性质的合作关系,如 2018 年 11 月,中国与菲律宾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① 2008 年,中国与日本曾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但后来关系出现波折。^② 中国与朝鲜在 1961 年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目前条约仍在自动延续状态。^③ 由于这些双边关系定位未出现“伙伴”一词,本文没有把它们纳入伙伴关系的范围。此外,中美于 2011 年曾就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初步共识,^④但此后中美关系性质发生变化,这一努力尚未落实,因此本文也未将其纳入伙伴关系范畴进行讨论。

四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伙伴国对中国的援助与支持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2020 年 2 月 12 日,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⑤2020 年 2 月

① 《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452/sbgx_676456/,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6 日。

②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1207_676848/t450471.s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6 日。

③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载《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12 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1207_680540/t788163.s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6 日。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载《人民日报》,2020 年 2 月 13 日。

23日,习近平强调“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① 2020年2月26日,习近平指出,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② 2020年3月4日,习近平指出,“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同时“防控要求不能降低”。^③ 据此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2020年2月23日是中国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段;疫情防控形势在2020年2月23—26日出现向好的转变,这一好转势头在2020年3月4日后继续保持。但一直到2020年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之前,中国抗疫一直面临巨大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很多伙伴国对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伙伴国在中国疫情防控最关键、最吃劲阶段提供的援助客观上具有更大价值,在疫情发生后很短时间内做出提供援助的政策响应能够更充分地显示伙伴国的政治意愿与行动速度。2020年1月23日后的一段时间内,部分国家把抗疫物资列为管制物资。如2020年4月7日,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发布一项临时规定,禁止在未经其明确批准的情况下出口某些个人防护设备,包括某些呼吸器、医用口罩和医用手套。^④ 可见,在这段时间内向中国援助抗疫物资更能体现一国对与中国关系的重视,对于判断双方合作水平具有指标意义。

为更好地分析在中国面临较大压力时各国对中国的支持情况,笔者把它们提供援助的时间范围限定在2020年1月23日到3月中旬。这主要出于三点考虑:首先,这是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压力最大的时期,此时获得外部支持的价值最大。其次,这一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向全球蔓延,一国能克服国际恐慌情绪向中国提供援助,说明其赋予对华关系较大的重要性。最后,2020年3月后随着中国境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和复工复产有序进行,中国的抗疫物资产能大幅提升,

①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载《人民日报》2020年2月24日。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近期防控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载《人民日报》2020年2月27日。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载《人民日报》2020年3月5日。

④ 2020年12月31日,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将这一临时规定的有效期进一步延长至2021年6月30日,并将注射器和针头添加进限制产品名单。两份出口禁令的内容参见“Prioritization and Allocation of Certain Scarce or Threatened Health and Medical Resources for Domestic Use,”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0-04-10/pdf/2020-07659.pdf>, 访问时间:2021年8月24日。“Prioritization and Allocation of Certain Scarce or Threatened Health and Medical Resources for Domestic Use,”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0-12-31/pdf/2020-29060.pdf>, 访问时间:2021年8月24日。

开始转而他国大规模提供抗疫物资援助,这也使他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意义显著下降。

表2总结了2020年1月底到3月初之间的四个时间节点上他国向中国援助抗疫物资的情况。在考察他国对中国的抗疫援助以及伙伴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时,本文重点考察两方面:一是伙伴国在向中国提供援助方面是否比非伙伴国更积极,二是伙伴关系层级的作用是否有明确体现。为考察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方面是否比非伙伴国更积极,不仅要观察提供援助的国家中伙伴国和非伙伴国所占的比例,还要比较伙伴国中提供援助的国家比例与非伙伴国中提供援助的国家比例。由表3可知,在四个时间节点上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比例都明显高于非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比例,其变化区间在2.2—6.7倍。

表2 2020年1月底至3月初外国援助中国抗疫的基本情况

截止时间	援助国数量	具体国家	伙伴国数量	伙伴国占比
2月2日 12时	11个(提供抗疫 医疗物资)	韩国、日本、英国、法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匈牙利、伊朗、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	9个	81.8%
2月5日 12时	21个(提供抗疫 医疗物资)	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个	90.5%
2月14日 12时	33个(提供抗疫 医疗物资)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柬埔寨、加拿大、埃及、法国、德国、加纳、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泊尔、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苏里南、塔吉克斯坦、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阿联酋、英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27个	81.8%
	17个(宣布提供 医疗物资捐助)	奥地利、巴西、刚果(布)、哥斯达黎加、捷克、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挪威、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	12个	70.6%
	7个(提供其他 形式的支持)	智利、赤道几内亚、朝鲜、马尔代夫、蒙古国、缅甸、瓦努阿图	6个	85.7%

续表 2

截止时间	援助国数量	具体国家	伙伴国数量	伙伴国占比
3月2日	63个(提供或宣布提供医疗物资)	阿尔及利亚、阿联酋、埃及、爱沙尼亚、奥地利、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林、巴西、白俄罗斯、波兰、英国、韩国、丹麦、德国、多米尼克、俄罗斯、厄瓜多尔、法国、菲律宾、刚果(布)、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加拿大、加纳、柬埔寨、捷克、卡塔尔、科特迪瓦、肯尼亚、拉脱维亚、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美国、蒙古国、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挪威、日本、塞尔维亚、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苏里南、塔吉克斯坦、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伊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	46个	73.0%
	8个(提供或宣布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	朝鲜、赤道几内亚、吉布提、马尔代夫、尼日利亚、斯里兰卡、瓦努阿图、智利	7个	87.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新华网相关材料整理。按照表中的四个时间节点分别参见《2020年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39521.s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18日;《2020年2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40789.s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18日;《2020年2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44959.s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18日;《患难见真情!国外援助中国抗疫物资清单》,http://www.xinhuanet.com/2020-03/07/c_1125677649.htm,访问时间:2021年5月22日。

表 3 伙伴国和非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抗疫物资援助的比例

截止时间	伙伴国数量	提供援助的伙伴国数量	伙伴国提供援助的比例	非伙伴国数量	提供援助的非伙伴国数量	非伙伴国提供援助的比例
2月2日12时	105个	7个	6.7%	75个	2个	2.7%
2月5日12时		19个	18.1%		2个	2.7%
2月14日12时		33个	31.4%		7个	9.3%
3月2日		54个	51.4%		17个	22.7%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网站以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数据按伙伴关系类型分类整理形成。

表4呈现了截至2020年2月14日不同层级伙伴关系国家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的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后约三周时间内,41.9%的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或承诺提供援助,这说明在中国面临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时伙伴国在第一时间提供有力支持的比例相当高。在按照伙伴关系重要性划分的六个层级中,最高层级伙伴关系提供援助的比例是100%,前四大类伙伴关系提供援助的比例达54.5%,重要性相对较低的两大类伙伴关系提供援助的比例为20.5%。这说明层级较高的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支持的比例相对更高。

表4 不同层级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情况(截至2020年2月14日)

伙伴关系层级	国家数量	其中提供或承诺提供援助的国家数量	占比
最高层级伙伴关系	2个	2个	100%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4个	6个	42.9%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8个	3个	37.5%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2个	25个	59.5%
战略伙伴关系	22个	4个	18.2%
合作伙伴关系	17个	4个	23.5%
伙伴关系合计	105个	44个	41.9%
非伙伴关系合计	75个	13个	17.3%
总计	180个	57个	31.7%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网站以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数据按伙伴关系类型分类整理形成。

以上是对相关数据的直观判断,更准确的判断需要基于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在疫情突发状态下,一国是否在短时间内向中国提供援助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包括:(1)对象国的经济能力。经济能力直接影响对象国向他国提供援助的能力,如果经济能力不足,一国即使有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的意愿可能也难以快速付诸实施。经济能力又包括两方面,一是伙伴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总量高的国家向他国提供援助的能力更强。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发达国家向他国提供援助时承受的经济压力相对较轻,因此该因素也会影响一国提供援助的意愿和能力。(2)对象国与中国经济关系的紧密度,特别是中国对于该国的经济重要性,可以用对华贸易依赖度近似衡量。高水平的经贸关系意味着双方存在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和更大的共同

利益,这可能影响一国在抗疫合作中的态度。(3)对象国是否为美国盟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是否为美国盟国可能影响相关国家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态度。(4)对象国的医疗服务能力。一国的医疗服务能力会对其提供抗疫援助的能力形成直接制约。医疗能力强的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有更大余力。医疗能力低下的国家即使有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意愿也很难迅速采取实质性行动。(5)对象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地理距离是影响疫情传播的重要因素,一国疫情失控更容易对其邻近国家产生影响。地理影响不局限于疫情方面,疫情所造成的其他经济社会影响也更容易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国家间扩散。(6)对象国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①周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具有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含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和感情纽带更紧密,周边国家更容易对中国的疫情感同身受而伸出援手。为探讨上述因素对提供援助的影响,笔者进行了变量操作与数值处理(见表5)。

表5 伙伴关系与抗疫援助变量

影响因素	变量名	赋值说明
伙伴关系层级	x_1	取2019年年底时的数据,无伙伴关系=0、合作伙伴=1、战略伙伴=2、全面战略伙伴=3、战略合作伙伴=4、全面战略合作伙伴=5、最高层级伙伴=6
对象国GDP	x_2	基于2019年GDP数据,取自然对数
对象国人均GDP	x_3	基于2019年人均GDP数据,取自然对数
对华贸易依赖度	x_4	基于2019年数据
是否为美国盟国	x_5	基于2018年的数据赋值,美国及其盟国=1、其他国家=0
医疗服务能力	x_6	基于各国2016年医疗服务可获得性和质量指数(HAQ指数)
地理距离	x_7	取中国与相关国家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取自然对数
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	x_8	周边国家=1、其他国家=0
是否提供援助	y	取截至2020年2月14日的数据,提供或承诺提供援助=1、其他=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本文的周边国家采纳大周边概念,具体包括东南亚11国(东盟10国和东帝汶)、东北亚4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国)、俄罗斯、阿富汗、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以及南亚6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共计28个国家。也有学者把澳大利亚纳入中国的大周边范畴进行分析,这是一种更宽泛的认识,本文未把澳大利亚纳入周边范畴。

由于本文旨在衡量这些因素对于建交国在 2020 年 1 月底到 3 月初是否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影响,因此各自变量都取此前的数值,其中大部分是 2019 年的数据,少数数据的时间更早一些,这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

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的计算公式^①如下:

$$trade_dependence = \frac{EX_{A_CN} + IM_{A_CN}}{EX_A + IM_A} \quad \text{式 1}$$

其中 EX_{A_CN} 指 A 国向中国的出口额, IM_{A_CN} 指 A 国从中国的进口额, EX_A 为 A 国的出口总额, IM_A 为 A 国的进口总额。

根据上述指标,基于获得的数据^②对相关变量用 R 软件进行 Logistic 逐步回归。由于伙伴关系层级是本文关心的核心变量,笔者首先以伙伴关系层级为自变量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然后逐步引入其他控制变量,得到的结果见表 6。

表 6 对象国对中国抗疫援助的 Logistic 逐步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伙伴关系层级(x_1)	0.4554*** (4.481)	0.36814*** (3.352)	0.4304*** (4.277)	0.27263* (2.352)	0.25384* (2.162)	0.22863+ (1.879)
对象国 GDP(x_2)		0.42235*** (4.387)	1.4136** (2.672)	1.56038** (2.889)	1.28827* (2.301)	1.33223* (2.331)
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x_8)			0.2632* (2.162)	0.37185** (2.721)	0.38952** (2.801)	0.38000** (2.685)
医疗服务能力(x_6)				0.02616* (2.262)	0.03362** (2.630)	0.03479 (1.588)
对华贸易依赖度(x_4)					0.02574 (1.527)	0.02821 (1.639)
对象国人均 GDP(x_3)						-0.02544 (-0.082)

① 本文的计算方法借鉴了张雨佳等的做法,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他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而非中国对他国的贸易依赖度,因此微调了计算方法。参见张雨佳、张晓平、龚则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依赖度分析》,载《经济地理》2017 年第 4 期,第 21—31 页。

② 完整数据集可联系笔者获取。

续表 6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是否为美国盟国 (x_5)						0.26296 (0.592)
地理距离(x_7)						0.30713 (0.686)
常量	-1.6248*** (-6.032)	-11.9735*** (-4.949)	-12.2151*** (-4.833)	-10.21365*** (-3.994)	-10.61590*** (-4.076)	-12.73313** (-2.664)
AIC 值	206.33	184.26	178.67	175.19	174.78	179.87
正确预测的比例	67.2%	75.6%	76.1%	78.3%	76.7%	77.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正确预测的比例的含义是,对每一个对象国,在模型中根据自变量观察值预测其是否提供援助,预测值与实际值相一致的情况所占的比例。其中,预测值是一个概率值,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类:提供援助的概率大于 0.5,取值 1;提供援助的概率小于 0.5,取值 0。+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括号中的数值为 z 统计量。

可以看到,在未引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伙伴关系层级与对象国是否提供抗疫援助存在很高的统计显著性,该因素对于他国是否对华提供援助的预测正确比例为 67.2%,说明其具有较强解释力。在逐步回归过程中,其他变量的引入顺序依次为对象国的 GDP、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对象国的医疗服务能力和对华贸易依赖度。引入这几个变量后,模型的 AIC 值达到最小。如果继续引入其他变量,模型的 AIC 值开始增大,拟合优度下降。模型 5 与模型 4 相比,虽然 AIC 值有微小下降,但引入的变量没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 4 中,每一个变量都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p < 0.05$)。而且模型 4 正确预测的比例最高(78.3%),即对于 180 个建交国中的 141 国而言,基于自变量的观察值,该模型对于其是否提供援助的预测与其是否提供援助的实际取值一致。为此,我们以模型 4 为最优模型,^①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如下:

$$\text{logit}(\hat{P}) = -10.00247 + 0.37185 * x_1 + 0.27263 * x_2 + 0.02616 * x_6 + 1.56038 * x_8$$

式 2

其中 x_1 的比值比(odds ratio,下文简称 OR 值)为 1.45,^②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

① 这与不以伙伴关系层级为核心变量、直接对相关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得到的最优模型相同。

② OR 值是对一种特定因素与结果之间关联性的衡量标准,表示在该因素条件下发生结果的概率,与在没有该因素条件下发生结果的概率相比。它最常用于病例对照研究。OR 值 = 1 表示该因素不影响结果的概率,OR 值 > 1 表示该因素与更高的结果概率相关,OR 值 < 1 表示该因素与较低的结果概率相关。关于 OR 值的具体介绍,参见 Magdalena Szumilas, "Explaining Odds Ratios,"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19, No.3, 2010, pp.227-229。

响的情况下,伙伴关系层级高的国家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更大,伙伴关系层级每提高一级,对象国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的概率与不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的概率的比值约增加45%。 x_2 的OR值为1.313,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经济总量高的国家更可能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 x_6 的OR值为1.027,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医疗服务能力强的国家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更大。 x_8 的OR值为4.761,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周边国家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更大,其提供援助的概率是非周边国家提供援助的概率的4.76倍。在模型1到模型5中,伙伴关系层级都具有很高的统计显著性,说明对象国是否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的不同层级对于其是否提供抗疫援助确实会产生影响。在模型2到模型5中,对象国的经济总量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说明对象国的经济实力对其是否提供抗疫援助具有稳定的作用。此外,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在大部分模型中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其OR值大,说明在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方面,周边国家的态度与非周边国家的态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相比之下,对象国的人均GDP和地理距离对于其是否提供援助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是否为美国盟国对于对象国是否提供援助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对象国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对于其在疫情危机状态下是否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影响较小,这可能与疫情本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关。根据本文统计,在中国的建交国中有62个国家是美国或其盟国,^①其中26国在2020年2月14日以前向中国提供了抗疫援助,占比41.9%;另有118个国家不是美国盟国,其中31国在2月14日以前向中国提供了抗疫援助,占比26.3%。美国盟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比例更大。这说明尽管很多国家同属美国盟国与中国伙伴国,两者在很多政策领域也可以并行不悖。这一发现提示,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边压力,使其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冲。为更充分地考察与中国经济关系紧密度的影响,本文在上述数据中增加一个变量“对华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对象国2019年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并取自然对数,^②并再次进行Logistic逐步回归。结果显示,引入的变量及顺序与上面相同,说明这一因素对他国是否向中

① 对于是否为美国的盟国,根据联盟条约与条款数据库(ATOP)的数据,确定到2018年为美国盟国的国家,其中不包括仅签订互不侵犯性质条约的国家。

② 采用FDI流量数据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关于他国2019年在中国FDI存量的较完整数据。FDI流量数据来自2018—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大部分国家取2019年的数据,部分国家用邻近年份数据代替,另缺乏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巴勒斯坦、北马其顿、贝宁、东帝汶、所罗门群岛、索马里等58国数据,大多是由于金额较低,难以统计造成,对它们统一赋予最小值1万美元。由于这一变量的数据可靠性存在不足,因此在模型一开始没有直接引入。

国积极提供抗疫援助的影响不显著。

人们对于伙伴关系层级的划分可能存在不同认识。在四大类战略性伙伴关系中,同时加上“全面”“合作”两个定语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层级高于只有其中一个定语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全面”“合作”定语之一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层级高于不含两者中任何一个的战略伙伴关系。不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上下层次关系有一定模糊空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比战略伙伴关系在性质上高一级,但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则在关系程度上更深。为考察伙伴关系层级作用的稳健性,本文用两种方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第一种方式认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层次上高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即在战略伙伴关系的修饰语中,赋予全面比合作更大的重要性。据此对伙伴关系层级重新赋值,战略合作伙伴=3,全面战略伙伴=4,其他伙伴关系分值不变。重新进行 Logistic 逐步回归的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引入顺序依然与上面相同,在最优模型中,伙伴关系层级的统计显著性更高($p < 0.001$)。因变量 y 对自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如下:

$$\text{logit}(\hat{P}) = -9.69537 + 0.41470 * x_1 + 0.23995 * x_2 + 0.02754 * x_6 + 1.64175 * x_8$$

式 3

在式 3 中,伙伴关系层级的 OR 值从 1.454 上升为 1.514,其对对象国是否提供抗疫援助的影响增强。这或许说明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置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上是更合理的做法。

第二种方式较为保守,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并为一类,由此避免了判定两者谁高谁低的问题。这样,伙伴关系层级从六类减少为五类。重新赋值并进行 Logistic 逐步回归的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引入顺序不变,最优模型的自变量与上面的模型相同,回归模型如下:

$$\text{logit}(\hat{P}) = -9.83963 + 0.47257 * x_1 + 0.25211 * x_2 + 0.02613 * x_6 + 1.60320 * x_8$$

式 4

在式 4 中,伙伴关系层级的 OR 值进一步上升到 1.604,说明伙伴关系层级减少一级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伙伴关系层级提高一级,对象国对华提供抗疫援助的概率与不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的概率的比值增加幅度更大。

上述两种方式进行的回归分析显示伙伴关系层级的作用具有稳健性。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伙伴关系层级对因变量的取值具有较明显的效应,说明中

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伙伴关系层级具有现实意义。此外,对伙伴关系层级进行调整后,最优模型中出现的其他变量相同,显示其他三个因素的作用具有稳定性。

在2020年2月14日后,随着时间推移,高层级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比例继续上升。截至2020年3月2日,战略合作伙伴国提供援助或承诺提供援助的比例从37.5%上升到75%,战略伙伴国提供援助或承诺提供援助的比例从18.2%上升到36.4%,两者都提高了1倍,其上升速度明显快于非伙伴国,伙伴关系及其层级所具有的政策效应得到进一步体现(见表7)。

表7 不同层级伙伴国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情况(截至2020年3月2日)

	国家数量	提供或承诺提供援助的国家数量	占比
最高层级伙伴关系	2个	2个	100%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4个	7个	50%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8个	6个	75%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2个	27个	64.3%
战略伙伴关系	22个	8个	36.4%
合作伙伴关系	17个	4个	23.5%
伙伴关系国家合计	105个	54个	51.4%
非伙伴关系国家合计	75个	17个	22.7%
总计	180个	71个	39.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网站以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数据按伙伴关系类型分类整理形成。

五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对伙伴国的援助与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百年来最大的全球非传统安全危机。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中国在国内全力抗疫的同时,也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向他国施以援手,而从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援助到中国向他国提供援助,这一过程的转换非常迅速。中国对其他国家包括伙伴国的抗疫援助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本土抗疫依然面临巨大困难时,中国就已开始对外大规模提供援助,

对外援助的国家范围以及援助的物资总量上升得非常快。在和平时期短短几个月内提供如此大范围和大规模的对外援助在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直到2020年3月中旬,中国的疫情防控任务都十分艰巨繁重。2020年3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已向巴基斯坦、老挝、泰国、伊朗、韩国和日本等国和非洲联盟交付了医疗防护物资援助,已宣布对意大利、法国、塞尔维亚和伊拉克等几十个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物资援助,并支持友好国家在中国市场采购医疗物资。^①截至2020年3月26日,中国已分4批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在地域上包括28个亚洲国家、16个欧洲国家、26个非洲国家、9个美洲国家和10个大洋洲国家,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柬埔寨派出7批医疗专家组,并指导长期派驻在56个国家的医疗队。^②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政府已向12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援助。^③根据中国政府2020年6月7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截至5月31日,中国共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已经或正在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④从2020年3月18日到31日的短短14天里,中国已经提供抗疫物资的国家从5个上升到120个,平均每天增加8.6个国家。截至2020年5月31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已超过建交国的80%。

第二,从他国发生疫情到抗疫援助物资抵达,中国提供支持的响应非常迅速,体现了在危机状态下强大的国内动员能力和国际响应能力。2020年2月19日,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朗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此后伊朗确诊病例数量迅速上升,3月1日达到978例,3月10日达到8042例。^⑤针对伊朗的疫情,中国迅速提供了有力帮助。2020年2月25日,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和在伊中资企业紧急向伊朗捐赠25万只口罩,次日又捐赠5000人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2020年2月29日,中国第一批援助伊朗的专家团队携带部分援助医疗物资抵达伊朗。2020年3月15日,第二批援

^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实际情况可能略有出入,如当时中国向意大利提供的援助物资已到位。参见《2020年3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57637.shtml,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2日。

^② 《中国已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42311/42784/zy42788/Document/1676076/1676076.htm>,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2日。

^③ 《2020年3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64266.shtml,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2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6/07/content_5517737.htm,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2日。

^⑤ 相关数据来自世界实时统计数据(worldometers)网站,参见“Iran”,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iran/>,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3日。

助伊朗的志愿专家抵达伊朗。2020年3月25日,中国政府再次向伊朗援助一批数量可观的医疗物资。^① 中国的另一个全面战略伙伴意大利是2020年年初欧洲疫情严重的国家之一。2020年2月中旬,意大利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3月1日确诊病例达到1702例,3月10日达到10156例。^② 针对意大利的疫情,中国也迅速伸出援手。2020年3月12日,中国援助意大利医疗专家组携带包括重症监护病房(ICU)设备在内的31吨医疗物资飞抵罗马。2020年3月18日,中国派出的第二批医疗专家组抵达意大利,并随机携带呼吸机、监护仪和检测试剂等9吨援助物资。2020年3月25日,第三批中国医疗专家组携带大批医疗物资抵达意大利。^③ 短短14天里,中国向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欧盟重要成员和美国盟国的意大利派出三批医疗专家组,提供了数十吨医疗物资援助。中国对意大利疫情响应速度之快、支持力度之大,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考虑到中国在国内调配医疗专家、筹集和转运抗疫物资、同对象国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物资跨国交接需要履行的手续以及国际航班的调度与安排等援助过程涉及因素的复杂性,这一速度可谓相当惊人。它体现了中国在关键时刻对伙伴国提供高水平支持的意愿和政策执行力。中国在紧急时刻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援助不仅在于特殊时期提供了宝贵物资,更在于中国医疗专家组奔赴这些国家疫情最严重地区开展工作,也增强了当地抗击疫情的信心。

第三,伙伴国普遍得到中国的抗疫物资援助,许多非伙伴国在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后也得到中国政府的援助。中国还通过派遣医疗专家组的方式对很多国家提供了力度很大的支持。根据基于公开报道进行的数据统计,到2020年6月底,绝大多数伙伴国得到了中国的抗疫援助,其比例至少达到伙伴国数量的93%。^④ 事实上,中国政府表现出向所有伙伴国提供援助的政治意愿。同期,中国也向没有建立伙伴关系的75个建交国中的至少59国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⑤ 占比78.7%。中国抗疫援助的国

^① 相关情况整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网站,参见 <http://ir.chineseembassy.org/chn/sgzc/default.htm>,访问时间:2021年5月23日。

^② 参见“Italy,”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italy/>,访问时间:2021年5月23日。

^③ 《风雨同舟、携手抗疫 中国已向5国派出8批专家组》,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0/0326/c1008-31649711.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23日。

^④ 关于中国政府对他国的援助,笔者综合中国外交部、国家国际合作发展署、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以及其他网络来源信息整理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除越南、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牙买加和芬兰7国外,中国政府向所有其他伙伴国都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在上述7国中,中国分别于2020年7月、8月和9月向新西兰、牙买加和越南援助了抗疫物资。此外,2020年4月,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时表示中国愿帮助芬兰解决当前防疫物资短缺等困难。参见《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4月15日。

^⑤ 笔者根据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以及其他网络来源的信息整理。

际覆盖范围既体现了中国对伙伴关系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抗疫问题上积极履行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于中国提供抗疫援助的理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表示,中国的抗疫援助不仅讲“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更坚信“烈火炼真金,患难见真情”。^①“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含义是,对于此前援助过中国的国家,中国将以更大的力度提供支持,这隐含了中国与外国支持行为中的相互性,但这种互惠是延迟的而非同步的,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简单的功利计算。“烈火炼真金,患难见真情”则说明疫情危机本身是对中国与外国关系的一个检验,对于关系处于高水平、具有合作诚意的国家,中国在疫情发生的当下和未来都会予以较高度重视。在部分国家疫情暴发后,中国克服国内抗疫的困难,迅速派遣医疗专家组提供支持,而在疫情时期很少有国家会采取这种做法。中国派遣医疗专家组的规模远超任何其他国家(见表8)。

表8 中国向外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情况(截至2020年5月31日)

援助国家	抵达日期	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是否支援中国抗疫
伊朗	2月29日(3月15日派出第二批专家)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伊拉克	3月7日	战略伙伴关系	否
意大利	3月12、18、25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塞尔维亚	3月21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柬埔寨	3月23日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
巴基斯坦	3月28日(4月24日派出解放军抗疫专家组)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
老挝	3月29日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
委内瑞拉	3月30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否
菲律宾	4月5日	无	是
缅甸	4月8日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
哈萨克斯坦	4月9日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①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中国对外援助不仅讲投桃报李 更坚信患难见真情》http://news.cnr.cn/native/gd/20200326/t20200326_525030908.shtml,访问时间:2021年6月7日。

续表 8

援助国家	抵达日期	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是否支援中国抗疫
俄罗斯	4月11日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
沙特阿拉伯	4月15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埃塞俄比亚	4月16日(4月30日该医疗队转往吉布提)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否
布基纳法索	4月16日	无	否
乌兹别克斯坦	4月17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马来西亚	4月18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吉尔吉斯斯坦	4月20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科威特	4月27日	战略伙伴关系	否
吉布提	4月30日	战略伙伴关系	是
科特迪瓦	4月30日	无	是
津巴布韦	5月11日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否
刚果(金)	5月12日	无	否
阿尔及利亚	5月14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秘鲁	5月23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否
刚果(布)	5月23日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
塔吉克斯坦	5月24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
赤道几内亚	5月25日	无	是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外交部网站、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网站以及新华网等权威媒体信息整理。

注:是否支援中国抗疫是指截至2020年3月2日是否向中国提供或承诺提供援助。对于5月24日抵达塔吉克斯坦的抗疫医疗队,中国官方媒体采用了“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的提法,联合工作组共14人,由陕西省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包括呼吸内科、重症医学、护理、中医内科呼吸病和传染病防控等多学科医学专家。使用这一提法可能是因为在团队内包含了医学专家之外的其他专业人士。

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的国家既包含伙伴国也包括非伙伴国,中国对最高层级伙伴关系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均派遣了医疗专家组,派遣对象还包括6个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国、12个全面战略伙伴国、3个战略伙伴国以及5个非伙伴国家。

中国对建交国是否采取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这一力度很大的援助方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主要包括:(1)对象国是否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的层级;(2)对象国此前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3)对象国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4)对象国是否为非洲国家,因为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对非洲表现出特别的重视;(5)对象国的总体经济实力;(6)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水平;(7)对象国的医疗服务能力;(8)对象国是否为美国盟国;(9)对象国对中国的经济重要性,该因素可以用中国与对象国的贸易额、中国在对象国的直接投资两个指标近似地衡量。笔者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变量操作与数据处理(见表9)。

表9 中国是否派遣医疗专家组相关变量

因素	变量名	赋值说明
伙伴关系层级	x_1	取2019年年底时的数据,无伙伴关系=0、合作伙伴=1、战略伙伴=2、战略合作伙伴=3、全面战略伙伴=4、全面战略合作伙伴=5、最高层级伙伴=6
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	x_2	取截至2020年3月2日的数据,向中国提供援助或承诺提供援助=1、其他=0
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	x_3	周边国家=1、其他国家=0
是否为非洲国家	x_4	非洲国家=1、其他国家=0
对象国GDP	x_5	基于2019年GDP数据,取自然对数
对象国人均GDP	x_6	基于2019年人均GDP数据,取自然对数
医疗服务能力	x_7	基于各国2016年医疗服务可获得性和质量指数(HAQ指数)
是否为美国盟国	x_8	基于2018年的数据赋值,美国及其盟国=1、其他国家=0
与中国的贸易额	x_9	基于2019年数据,取自然对数
中国在对象国的直接投资	x_{10}	基于2019年中国在各国的FDI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
是否派遣医疗工作组	y	取截至2020年5月31日的数据,派遣医疗工作组=1、其他=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变量赋值过程中,由于上一部分的稳健性分析似乎暗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层级应高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笔者对伙伴关系层级的赋值做了微调,即战略合作伙

伴=3、全面战略伙伴=4,其他伙伴关系分值不变。根据上述指标,基于获取的数据对相关变量进行 Logistic 逐步回归,①结果见表 10。

表 10 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的 Logistic 逐步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伙伴关系层级(x_1)	0.5617*** (4.370)	0.4830*** (3.575)	0.4361** (3.253)	0.3234* (2.216)	0.30223* (1.980)
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x_2)		1.0643* (2.200)	1.4986** (2.770)	1.2210* (2.143)	1.19113+ (1.864)
对象国人均 GDP(x_6)			-0.4890* (-2.553)	-0.5371*** (-2.795)	-0.42216 (-1.040)
中国在对象国的直接投资(x_{10})				0.2515+ (1.696)	0.14898 (0.731)
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x_3)					-0.34675 (-0.423)
是否为非洲国家(x_4)					-0.44462 (-0.506)
对象国 GDP(x_5)					-0.19246 (-0.630)
医疗服务能力(x_7)					-0.01172 (-0.425)
是否为美国盟国(x_8)					-0.64598 (-1.001)
与中国的贸易额(x_9)					0.35908 (1.058)

① 这里涉及的变量除对象国是否为非洲国家、中国与对象国的双边贸易额、中国在对象国的 FDI 外,其他数据在上一部分的回归分析中都已经体现。中国与各国 2019 年双边贸易额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网站,参见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2851396/index.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0 日;中国对各国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5—60 页。其中缺少安道尔、摩纳哥、纽埃、圣马力诺和索马里 5 国数据,默认为投资存量很低,取他国中的最小值 1 万美元。此外,巴勒斯坦为 2018 年数据,萨尔瓦多为 2017 年数据。

续表 10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常量	-3.1191 ^{***} (-6.735)	-3.4882 ^{***} (-6.661)	0.5740 (0.364)	-1.3597 (-0.707)	-0.80218 (-0.182)
AIC 值	135.79	132.71	127.53	126.07	135.63
正确预测的比例	85.6%	85.6%	88.3%	87.8%	87.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代表 $p < 0.1$,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01$ 。括号中的数值为 z 统计量。

在 Logistic 逐步回归过程中,首先引入的自变量是伙伴关系层级,然后依次是对象国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对象国人均 GDP 和中国在对象国的直接投资。引入这 4 个变量后,模型的 AIC 值达到最小。如果继续引入其他变量,模型的 AIC 值开始增大,拟合优度下降。模型 3 和模型 4 各有优势,模型 3 正确预测的比例最高,模型 4 的 AIC 值最低。我们以模型 4 为回归模型,得到:

$$\text{logit}(\hat{P}) = -1.35968 + 0.32343 * x_1 + 1.22100 * x_2 - 0.53707 * x_6 + 0.25150 * x_{10}$$

式 5

其中 x_1 的 OR 值为 1.382^①,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更可能向伙伴关系层级高的国家派遣医疗工作组,伙伴关系层级每提高一级,中国向对象国派遣医疗工作组的概率与不向对象国派遣医疗工作组的概率的比值约增加 38%。 x_2 的 OR 值为 3.391,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更可能向此前向中国提供了援助的国家派遣医疗工作组,向这些国家派遣医疗工作组的概率是向其他国家派遣医疗工作组的 3.4 倍,说明中国与外国的抗疫合作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互性,虽然这种互惠在时间上不是同时发生的。 x_6 的 OR 值为 0.584,OR 值小于 1,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更可能向人均 GDP 较低的国家派遣医疗工作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在疫情下积极履行国际责任。 x_{10} 的 OR 值为 1.286,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更可能向在当地有较高直接投资的国家派遣医疗工作组,说明中

① 基于表 5 和表 9 对伙伴关系层级划分的不同方式,笔者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引入最优模型的变量相同。在逐步回归过程中引入模型的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与表 5 的赋值方式相比,基于表 9 的赋值方式得到的伙伴关系层级 OR 值更高,说明调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下层级的做法可能具有合理性。

国在派遣医疗工作组方面存在一定的经济考虑,这也是正常的政策反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向他国以派遣医疗工作组的方式提供高水平支持时受双方是否建立有伙伴关系和伙伴关系的水平、对象国此前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中国与对象国经济关系的紧密度等因素的影响。

从具体案例的角度,中国对位于伙伴关系最高层级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了力度很大的抗疫支持。2020年3月底4月初,俄罗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迅速上升,中国随后积极向俄罗斯提供防疫物资支持。中国政府援助俄罗斯的总重约25.5吨的首批抗疫物资于4月2日运抵莫斯科。^①4月11日,中国派遣的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俄罗斯。5月24日,王毅表示,中国是向俄罗斯提供抗疫物资支持最有力的国家。^②2020年2月底,巴基斯坦出现疫情后,中国迅速提供援助。到3月29日,中国已分四批向巴基斯坦提供检测试剂、医用防护服、医用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和呼吸机等医疗物资。3月28日,中国派遣的医疗专家组到达巴基斯坦。此外,中国于3月下旬开始帮助巴基斯坦建设隔离医院。4月24—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3架次空军专机向巴基斯坦运输防疫物资,同时派出军队抗疫专家组支持巴基斯坦防疫工作。^③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规模大、形式多,涵盖了医疗物资、医疗专家组、军队抗疫专家组以及援建隔离医院等多方面内容。这既是对巴基斯坦支持中国抗疫的感谢,也是高层级伙伴关系相互积极提供支持的体现。

六 结论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3年以来,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与105个国家建立不同性质的伙伴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国家数量大、覆盖地域广、内部层次多的伙伴关系网络。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来自美国及其联盟体系的压力,部分学者提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否能经受大国战略竞争压力考验的疑问。

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国与伙伴国抗疫合作行为的数据分析,发现伙

^① 《张汉晖大使接受中新社专访:俄疫情发展到关键节点 中俄抗疫体现关系特殊性》<http://ru.china-embassy.org/chn/sghd/t1768546.htm>,访问时间:2021年5月23日。

^② 《王毅:中俄相互支持,是“政治病毒”攻不破的堡垒》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2020-05/24/c_1210631730.htm,访问时间:2021年5月23日。

^③ 相关情况整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网站,参见<http://pk.chineseembassy.org/chn/>,访问时间:2021年5月23日。

伴国在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方面总体比非伙伴国更积极。在疫情引发的危机背景下,很多伙伴国都能快速向中国提供颇为有力的支持,一些国家为此克服了不小的国内困难,这样的支持不是为了立即获取具体可见的回报。这一事实说明,伙伴关系虽然主要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非强制性的自愿合作,但在危机状态下,依然具有较强行动能力。伙伴关系不仅能在经贸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高水平的合作。

影响建交国对华抗疫援助的主要因素是对象国的GDP、是否为中国周边国家、是否建立有伙伴关系和伙伴关系层级以及对象国的医疗服务能力。美国盟国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的比例高于非美国盟国,说明即使在中美战略竞争较为激烈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的大部分盟国依然可以开展高水平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层级与伙伴国是否向中国提供支持间虽然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但伙伴关系层级对伙伴国是否向中国提供援助确实产生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说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不同层级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这并不因某些伙伴关系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而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绝大多数伙伴国都得到了中国有力的抗疫物资援助,中国还通过派遣医疗专家组的形势,对很多国家提供了力度很大的支持。对外抗疫援助的范围和规模体现了中国在危机状态下强大的国内动员能力和国际快速响应能力。中国在向他国以派遣医疗专家组的形势提供高水平支持时,受到双方是否建立伙伴关系及伙伴关系层级、对方此前是否向中国提供抗疫援助、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中国与对象国经济关系的紧密度等因素的影响。它体现了伙伴关系在抗疫合作中的作用,显示中国与他国的抗疫合作存在一定的互惠性及利益考虑,同时体现了中国在疫情下积极履行国际责任。

对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与伙伴国相互支持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危机状态下伙伴关系合作的可靠性以及伙伴关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有效性的认识,对于如何进一步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启发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对危机状态下中国与外国合作行为的认识。

(截稿:2022年3月 责任编辑:郭 泉)

Abstracts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ainst the Pandemic: Mutual Support Behaviors Between China and Partner Countries

Zhou Fangyin (4)

【Abstract】Building a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major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nd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with a large system , complex structure and wide coverage. There are certain academic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role of the partnership network ,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hether the mutual support of partnership countries is reliable due to the non-binding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 whether partner countries can cooperate effectively in the security field; whether the partnership can work in a crisis state or when the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is intense; and whether there i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level of partnership and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mutual support behaviors between China and partner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ndemic , this paper finds that partner countrie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active in providing anti-pandemic assistance to China than non-partner countri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anti-pandemic assistance to China are the overall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target country , whether it is a neighboring country , whether there is a partnership and the level of the partnership , and the medical service capacity of the target country.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igh level of anti-pandemic assistance provided by China to other countries are whether the two sides have established partnership and the level of partnership , whether the other side has previously provided assistance to China ,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arget country , and the closeness of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target country.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economically strong countries were more likely to provide anti-pandemic assistance to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isis , and China was more likely to provide high levels of anti-pandemic support to countries with low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anti-pandemic cooperation with partner countries has shown some reciprocity. The paper's analysis help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hina's partnership network , the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ooperative behavior with its diplomatic countries in a stat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risis , and is enlightening on how to further build a more effective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Key Words】major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COVID-19 pandemic , partnership network , anti-pandemic assistance ,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uthor】Zhou Fangyin ,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he National Image Management Effect of China's Foreign Aid: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DELT Big Data

Liu Lina (34)

【Abstract】Foreign aid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foreign policy tool to build the national image. However , China's foreign aid has faced many criticisms and doubts in recent years. Could foreign aid improve the public impression of China? Existing studies do not give a clear answer or even draw an opposite conclusion. The author proves that China's foreign aid projects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national image management. The author firstly puts forward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In the empirical part , the author uses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 to analyze 1316803 observations from the Global Event , Language and Tone Database (GDELT) and China's foreign aid projects from 2000 to 2014. China favours ameliorative aid , in other words , channeling aid to areas where it is viewed negatively.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the impression of China by aid reaches its peak within five or six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aid project , and then gradually weakens , but the long-term effect still exists. However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 there is a reverse effect and regression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spire China to be strict with itself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public opinion feedback when implementing foreign aid projects , to achieve a "soft landing" rather than a "hard landing". At the same time ,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long-term impetus of the aid projects to enhance the durability and long-term effect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s impression of China.

【Key Words】foreign aid , national image management , time effect , distance effect ,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